

#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智慧与创新

王逸舟

从全球视角观察,在 21 世纪初,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上,基于中国国情和对外部因素的统筹分析,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,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“和平发展”道路,中国也将致力于推动“和谐世界”的建设。尽管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提出过对外交往的“和平共处”五项原则,在邓小平时代曾经提出过当今世界是“和平与发展”时代的战略判断,后来又提出过类似“和平崛起”的基本思路,但像现在这样明确把“和平发展”与“和谐世界”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两大目标,尚属首次。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、发展速度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,无论怎么评价这种承诺的重大意义都不为过。事实上,人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评估与论断,不管他们见仁见智、见木见林。

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,上述承诺不仅意味着不断增大的压力,更含有一种不可回避的责任。若细致讨论起来,关于这类压力和责任,可以列举出无数的理由,涉及当代国际关系的诸多领域,如保护人权与实现性别平等、能源开发与合理利用、环境改善与可持续性发展、帮助落后国家与地区脱贫、完善军控与防核扩散体系、消除冲突热点与建立区域安全机制、有效保护与利用知识产权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多边贸易规则、推动全球治理与联合国改革,等等。几乎在所有这些领域,中国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,都有自己的强项与弱点(包括若干个“盲区”),都有不同程度的机遇与挑战;很多问题是 we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(乃至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未曾面对的),有些是过去处理不当或留有教训的(甚至是严重的挫折与失败)。怎样从理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,如何从不同方向及侧面集思广益并且探究新的路径,尤其是思考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建立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均衡点(即实现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某种平衡),这不仅仅是任何事务部门和主管单位的主要工作,更应是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根本使命。

这里,我要特别强调智慧与创新的关键性作用。有些研究课题和任务,只要具备足够的资料与信息、只要研究者有耐心并且工作勤勉,完成它们是可以预期的,如对某些国别和事态的跟踪与预报。但涉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它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多数探索项目,例如,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难题、构思新时期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、推动包括安理会结构改革在内的联合国体系的有效改革、妥善处置“主权与不干涉”原则与“合理介入、共同进步”原则之间的一系列矛盾,我们不止是需要“工匠式”的劳作、上传下达的信息调研或一般分析过程的程序推进,更需要基于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智慧创作和勇于超越前人的大胆创新。一个真正有智慧、有创新的重大理论研究,也许无法为解决当下涉外部门的某个案件提供具体的办法,但它要么开辟出新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,要么照亮了“漫长隧道”的轮廓与出口,要么奠定了长远和根本性解决办法的基石。占人类 1/5 的中国人,应该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创新。

看上去,人类目前所处的是一个混乱的、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但也是一个给思考者无穷机会的伟大时代。对于那些寻求安逸的人,需要的或许是克服这种时代带来的麻烦与焦虑;而对于真正的思想者和科学家,他们感到的更是庆幸与满意。

但愿《世界经济与政治》杂志的投稿者、批评者和众多的读者有类似的庆幸与满意!